

毛泽东领导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 戴和圣

中国共产党具有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优良传统，在井冈山根据地时期就积极开展群众卫生运动，将搞好卫生防疫工作视为关系革命成败的大事。毛泽东高度重视爱国卫生工作，多次专门讲话、批示、题词，亲自主持召开会议，经常过问、调研工作开展情况，为抓好爱国卫生运动“划重点”。

注重依靠群众发动群众

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开创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方法，成为解救人民于疫病的重要法宝。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的传染性、地方性疾病大面积流行，东北地区还在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细菌战中受到波及，新生政权的巩固面临困难和挑战。为应对这种严峻形势，党领导人民迅速广泛地开展起群众卫生运动，打造摆脱“瘟神”威胁的有效武器。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独具中国特色的群众性卫生运动组织——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应运而生，中央及全国各地还相继成立防疫委员会，创造性开展捕鼠灭虱运动和清洁卫生活动，有力回击了美国侵略者的细菌战，也使广大群众受到深刻的清洁卫生教育。在毛泽东看来，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不仅对外御敌，而且对内提振中华民族的精气神，如果动员全体人民参与，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

毛泽东把搞好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和促进人民身心健康紧密联系起来。在为1952年12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中号召人民群众“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爱国卫生运动由此转变为经常性的工作，成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重要内容。毛泽东深切感受到人们在朝鲜战争后的很长时间里，生产生活深受“四害”的影响，提出在全国各地大举进行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各地尚未动员的必须立即动员起来。”“环境卫生，极为重要，一定要使居民养成卫生习惯，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

毛泽东并非孤立地强调爱国卫生运动，而是辩证地将抓好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同搞好生产发展结合起来，认为“把卫生工作看作孤立的一项工作是不对的”。卫生工作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学习，有利于改造我国人民低弱的体质，使身体康强，环境清洁”。因此，必须大张旗鼓，大做宣传，使得家喻户晓，人人动作起来。

与体育运动联系起来研究部署

毛泽东心系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将体育运动和爱国卫生工作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和部署。

在毛泽东看来，体育运动是人类自然而然的养生之道。“体育者，人类自养其生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也。”在指示“把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时，毛泽东还不忘围绕人们身边的体育活动进行指导，提出凡能做到的，都要提倡做体操，打球类，跑跑步，爬山，游水，打太极拳及各种各色的体育运动。

毛泽东认为，人的体质之差别将决定习得知识、胜任工作的程度，“今世百科之学，无论学校独修，总须力能胜任。力能胜任者，体之强者也；不能胜任者，其弱者也。强弱分，而所任之区域以殊矣。”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将发展体育运动作为国家战略，亲自布局、亲自过问、亲自指导。1952年6月10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毛泽东欣然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成为我国发展体育卫生事业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提出，“德、智、体”和谐共生、协同发展，也是关于人的发展的教育思想。同理，爱国卫生运动说到底也是改造人的工作，与体育一道殊途同归。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就系统阐述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关系，“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认为知识诚然可贵，人之所以与动物有差别就是这个原因；道德也的确可贵，用来在群体生活中管束自己的言行。“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可见体育在毛泽东心中的重要地位。

重点发展医药卫生事业

毛泽东强调，重视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发展中国的医药科学，培养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队伍，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应极力发展这项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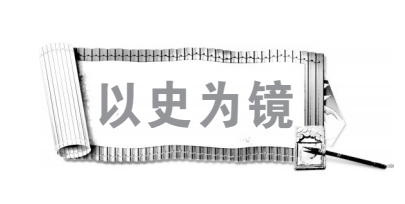
在陕甘宁边区期间，毛泽东就提

出搞好农业农村发展的同时要抓好卫生防疫工作，“在五年到十年之内，我们要求得在科学知识普及方面的进步，医药卫生应该放在我们的计划里，和生产计划同时并进。”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这一实际，提出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在农村。1965年，毛泽东亲自起草《关于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问题》，接见医务工作人员，强调“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毛泽东指明了一条发展中国特色医药的道路，那就是挖掘传统中医药优势，坚持中西医结合。“中医药是一个宝库，要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毛泽东从文化视角辩证地解读中西医的关系，强调既要尊重我们的中医这个文化遗产，也要善于用西医的科技来发展我们的传统医学。他并不认为中医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问题，要把中医提高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高度，“我们中国的医学，历史是最久的，它有丰富的内容。”主张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

毛泽东主张各类医药队伍要协调共生、携手发展，强调敬畏生命，以人民为中心。面对陕甘宁边区人、畜死亡率高，而许多人还相信巫神这一实际情形，毛泽东提出不仅要依靠新医，也要联合旧医和旧式兽医，训练他们成为人民的医生，关心人民的痛苦。毛泽东先后题词，勉励延安中国医科大学“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号召全社会“尊重护士，爱护护士”，指示医药卫生界要“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

开展好爱国卫生运动，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是根本工作路线，体现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价值导向；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是提升人民幸福安全感的关键支撑，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旨归；发展医药卫生事业，提高整体医药水平是重要保障，体现了维护人民健康利益的价值追求。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对如今我们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延安精神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些外国友人高度关注，他们从坚定信念、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和为民服务等各个方面描述共产党人这种精神风貌。通过他们的传播，中国共产党人及其倡导的延安精神为世人所知。

闪烁着“兴国之光”的“神奇的队伍”

全面抗战爆发初期，一些外国友人通过他们手中的笔和镜头彰显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艰苦朴素的作风等革命风貌。最早描述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风貌的是第一个到达陕北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向世人揭开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神秘面纱，使得全世界开始了解中国共产党人。接着，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海伦·斯诺、詹姆斯·贝特兰等数十位外国人先后到达陕北苏区，将清贫而廉洁的共产党员、装备低劣却奋战在民族解放第一线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呈现给世人。

经过4个月与共产党人朝夕相处，斯诺采访了上至领袖毛泽东下至普通战士等许多共产党人，搜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并迅速撰写了全面系统介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的《红星照耀中国》，该书问世后迅即风靡世界。书中，斯诺首次向世界全

面报道了红军长征，称“长征是军事史上一场伟大的壮举”。他的描述引起世人的关注，当时美国“差不多每一位评论家都选出斯诺对长征的描述加以评论”。通过长征，世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人类历史上的奇迹，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坚韧和执着；另一方面，斯诺也展示了现实生活中的共产党人，如此的朴素、如此的奋发向上！

财政部部长林伯渠，身穿一套褪色的制服，红星帽的帽檐软垂，慈蔼的眼睛上戴着一副眼镜，一只腿架已经断了，用一根绳子系在耳朵上。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同部下一样仅有两套制服，另有一件用缴获的降落伞做的背心；伙食也同部下一样，一般是白菜、面条、豆子、羊肉；他善于驰骋，又能吃苦耐劳。斯诺还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大学——一所独特的高等学府，“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感慨之下，他将中国共产党人这种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称之为“东方魔力”，并断言这是“兴国之光”。

随后，斯诺夫人海伦进入延安，她以独特的身份走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张闻天等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经过接触发现他们

有着新思想、新精神，且在开辟着新天地。她发现中国共产党人的奥秘——在中国共产党内，一个人社会名望的上升和他降低自己生活标准的能力（在低标准情况下仍能保持工作效率不变）正好成正比例。能以最少量的东西维持生命，这就是天生优越的标志，也是天然领袖的资格。

第一个到延安和敌后根据地的西方国家军人是美国军官埃文思·卡尔逊。他见过毛泽东、朱德、聂荣臻、贺龙、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敌后根据地与八路军同甘共苦的生活，使他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八路军由衷地产生敬佩之情。在他的著作里，中国共产党人是一群大公无私的人、廉洁奉公的人。他认为八路军力量的源泉来自强大的思想政治工作，来自党员干部的以身作则、官兵一致，来自广大人民的支持。在延安，他住的是诺尔曼·白求恩大夫住过的窑洞。当然，作为延安精神的原生形态之一，白求恩精神也自然地出现在卡尔逊的著作中。

“还政于民，言必信，行必果”

抗战胜利前后，一些来到延安的外国记者、专家和军人纷纷撰写文

章的一大代表中，有一位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邓恩铭。他1901年生于贵州省荔波县的一个水族农家。小学毕业时，其远在山东任职的堂叔决定资助培养他，16岁的邓恩铭由此来到济南，进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继续求学。之后受到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走上革命道路，成为山东党组织的缔造者和早期领导者，曾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青岛市委书记等职。到1931年英勇就义，再没回过家乡。

在学校学习和投身革命的十几年间，邓恩铭主要通过书信与远在贵州的家人保持联系。目前留存的十几封家书，都是邓恩铭走上革命道路后在山东期间写给家人的，从中可以看出邓恩铭热爱家人、反抗旧俗和视死如归的优秀品质。

“知双亲一定挂念，但儿又何尝不惦念双亲呢”

无情未必真豪杰。投身革命的坚强男儿，也充满对家人的惦念和关爱。1924年邓恩铭负责青岛党的工作，积极策划四方机车厂和纱厂的工人运动，5月8日他给父亲写信提到：“不写信又三个月了，知双亲一定挂念，但儿又何尝不惦念双亲呢。儿一向很好，想双亲及祖母……均安康如常？”在另一封信中他嘱咐道：“母亲身体总要好好保养，多吃点有养料的东西……千万不可乱吃药，吃错了就坏事，务必注意。”投身革命无力顾及家庭时，他充满愧疚。1925年8月下旬，邓恩铭在潍县由山东各地党组织的代表选举为新的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任书记；9月他接到弟弟来信，因家乡遭灾，米价飞涨，希望他寄钱回家，帮助度过灾荒。他在复信中写道：“我从济南回到青州，就知道家乡米贵。但是我没有分文汇回去，使老老少少受点穷苦，实在是罪过！”而他以当时的职务，在争取中央增加经费的同时，自己也千方百计筹措资金。若有一点私心，是能够拿出一点钱来接济家里的。可他宁愿亏欠家里，也不愿影响革命，体现出了一名共产党人大公无私的高尚风范。

“儿生性与人不同，最憎恶的是名与利”

在关爱家人的同时，邓恩铭却没有惟命是从，不断对旧礼教进行反抗。他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1922年是他为革命工作不断奔走的一年，百忙中依然惦记家里，8月份的家信中，希望家里送妹妹到省城读书：“弟弟妹妹们都长大了……无论如何总要叫他们念书……此刻比从前不一样了，男女都是一样……总而言之，叫做男女平权。”对于当时盛行的父母给儿女包办婚姻，他明确反对，规劝父母抛弃陈旧观念：“父母辛苦费力哺育儿女，处处总为儿女好；不过一时比一时不同，从前是好的，那晓得反到害起儿女来，比比皆是，最头痛的就是替儿女订婚……父母的一片好心，做儿女的无有一个不感激，不过总盼望做父母改换改换方法来爱儿女就行了。”面对几千年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的世俗，他以在青岛做官的堂叔为例提醒父亲，“无论做官为宦，总要处处体贴老百姓，不用助人为恶，剥夺人民。二叔做官数年，一清到底……百姓没有不爱戴的，所以名誉很好！因此，父亲千千万万要像二叔一样才好。”他自己更是违背家庭意愿，投身革命活动。1924年5月8日，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说道：“儿生性与人不同，最憎恶的是名与利，故有负双亲之期望，但所志既如此，亦无可如何。”邓恩铭视名利如粪土，而“所志”正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儿生性与人不同，最憎恶的是名与利”

在关爱家人的同时，邓恩铭却没有惟命是从，不断对旧礼教进行

反抗。他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1922年是他为革命工作不断奔走的一年，百忙中依然惦记家里，8月份的家信中，希望家里送妹妹到省城读书：“弟弟妹妹们都长大了……无论如何总要叫他们念书……此刻比从前不一样了，男女都是一样……总而言之，叫做男女平权。”对于当时盛行的父母给儿女包办婚姻，他明确反对，规劝父母抛弃陈旧观念：“父母辛苦费力哺育儿女，处处总为儿女好；不过一时比一时不同，从前是好的，那晓得反到害起儿女来，比比皆是，最头痛的就是替儿女订婚……父母的一片好心，做儿女的无有一个不感激，不过总盼望做父母改换改换方法来爱儿女就行了。”面对几千年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的世俗，他以在青岛做官的堂叔为例提醒父亲，“无论做官为宦，总要处处体贴老百姓，不用助人为恶，剥夺人民。二叔做官数年，一清到底……百姓没有不爱戴的，所以名誉很好！因此，父亲千千万万要像二叔一样才好。”他自己更是违背家庭意愿，投身革命活动。1924年5月8日，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说道：“儿生性与人不同，最憎恶的是名与利，故有负双亲之期望，但所志既如此，亦无可如何。”邓恩铭视名利如粪土，而“所志”正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

邓恩铭在山东省立一中学习期间，受到《新青年》等进步书刊的影响和启迪。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邓恩铭等一批进步青年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扩大进步阵地，1920年秋，邓恩铭与省立一师学生王尽美，在济南发起成立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刊物。1921年春，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邓恩铭是小组负责人之一。7月，邓恩铭与王尽美一起作为济南代表，到上海参加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并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2年1月，邓恩铭出席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在苏俄学习考察。回国后，在山东负责党的工作，先后领导了1925年胶济铁路大罢工、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1925年11月，邓恩铭在济南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遭受残酷折磨。后因在狱中肺结核病情恶化，经地下党组织多方设法营救，得以保外就医。1929年1月，

“儿生性与人不同，最憎恶的是名与利”

在关爱家人的同时，邓恩铭却没有惟命是从，不断对旧礼教进行



邓恩铭因叛徒出卖再次被捕。在狱中，他受尽酷刑，毫不畏惧，发动领导了两次绝食斗争和两次越狱斗争，使7名同志先后脱险，而他自己因为身体病弱，未能逃脱，被投入死牢。1931年3月，邓恩铭给家中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写下诀别诗：“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表达了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家国情怀和对革命后继有人的坚定信心。4月5日清晨，邓恩铭等22名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杀害于济南纬八路刑场，史称四五烈士。

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对山东省的负责同志讲：革命胜利了，不要忘记老同志。你们山东应该把王尽美、邓恩铭同志的情况搞清楚，应该收集烈士文物。1961年，邓恩铭诞辰60周年、牺牲30周年、中共一大召开40周年，同为一大代表的董必武经过山东，感慨万千，赋诗一首回忆王尽美与邓恩铭：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舟泛语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

是她第一个把毛泽东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和“毛泽东思想”传播给全世界。

“延安时代给胜利者留下了一种革命斗争的英雄传统”

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延安精神的成熟和在国内宣传弘扬，一些外国友人开始从多个角度阐述延安精神。美国教授莫里斯·迈斯纳在他的专著《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中，专门有一节论述延安精神，称其为“延安传统”。他认为，“延安时代给胜利者留下了一种革命斗争的英雄传统，这就是被奉为神圣的‘延安精神’和‘延安作风’”“所有共产党人都把‘延安精神’称颂为壮丽的革命年代的象征”，这是“一种能为未来提供模式的活生生的革命传统”。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所着力称赞和高度评价的延安传统，是制度方面和革命价值观方面的遗产。他还进一步强调，“为当今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推崇备至的‘延安精神’，其主要内容，实际上是精神方面和伦理方面的，更具体地说，它是各种社会道德观念和生活态度，因为这些东西被他们看成革命变革的持续进程中的根本因素”。他提出延安精神是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念，包括“为人民的利益英勇斗争、敢于牺牲的观念；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勤俭节约、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以及自我约束等观念”。曾经的美军观察组成员高林·约翰专门撰写了《延安精神：战时中美友好篇章》，认为延安精神是一种无私奉献和团结友爱的精神。